



【民间忆旧】

## 煎饼， 家乡和妈妈的味道

□杨筱娜

朋友从华盛顿来纽约，说想吃我做的煎饼。

煎饼是临沂人的主食，我确实专门准备了一套煎饼炊具。不管离家多远，煎饼都有家乡和妈妈的味道。

在我很小的时候，有一天下午和邻居小伙伴玩累了，她说饿了，我们一起来到她奶奶家。她奶奶家是红砖白瓦的一间小房子，没有院墙，门前是一个青石板垒成的灶台，一个带烟囱的锅台。奶奶靠灶台坐在一个被磨得锃亮的木凳上，灶台上一个粗白瓷碗和一双竹木筷子，她去屋里拿了一块干的已卷不起来的煎饼，对折掰断放在碗里。我记不清她加的热气还是凉水，我是站着还是坐着，只记得伙伴吃那碗白水泡煎饼的声音，那碗白水泡煎饼真好！后来她奶奶给了她一小块咸菜疙瘩，她把咸菜撕成米粒大小，每吃一口煎饼放上一粒咸菜，我不记得当时有没有流口水，但我知道，我馋急了，如果我是画家，定能把我当时的眼神画得惟妙惟肖。如今的我吃过海参鲍鱼鱼翅龙虾，却没有一样可以和那个白水泡煎饼相媲美。

初中去县城上学，那大概是我“背井离乡”的开始，路途遥远只能一周回家一次。吃住在校，米饭没法带足一个星期的量，馒头硬了碎牙，只有煎饼仅耐储存，不会像米饭那么容易坏，而且保存恰当的话不会像馒头那么难以下咽。记得每次周末回家，星期天的早上妈妈总是起得尤其早，因为她要烙一大盆的煎饼，供我和哥哥一个星期的食量。等到一大黑瓷盆的面糊见了底，煎饼烙完就该是我的活了。我要把每一张煎饼折叠起来，数好我和哥哥分别要带多少，再用湿笼布包好装进干净的塑料袋里，保证煎饼不会风干变硬。我真心不想一个星期的每日三餐全是冷冰冰干硬硬的煎饼，尤其是在寒冬腊月，看着学校食堂里冒着热气的土豆炖肉，打饭师傅一手拿着饭盒，一手掌勺把金黄金黄的土豆泼在白花花的米饭上，酱油色的汤汁盖过米饭……然而我只是路过而已。我想彼时的我一定和看着邻居伙伴吃白水煎饼时的我一样。那个时候我最大的愿望不是希望成绩进步，而是什么时候可以不用每天都吃煎饼！如今算是愿望实现了。但，亦非我想。

“给我烙个鸡蛋煎饼。”朋友坐在沙发上看着《时代》杂志不经意的一句话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

我在平底锅上把面糊均匀抹开，打上一个鸡蛋，蛋清往周边散去，我赶紧用推子挡住然后均匀抹开，学着妈妈的样子。我想起陪妈妈烙煎饼，坐在装满麦梗的麻袋上，看妈妈头上顶着毛巾，低下头用力吹火，烟呛得妈妈只能眯着眼睛，但她还是用力吹，每当火苗蹿起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开心，大概是觉得母亲的努力没白费吧。

“给。”

“好吃！”

“少点啥。”

“啥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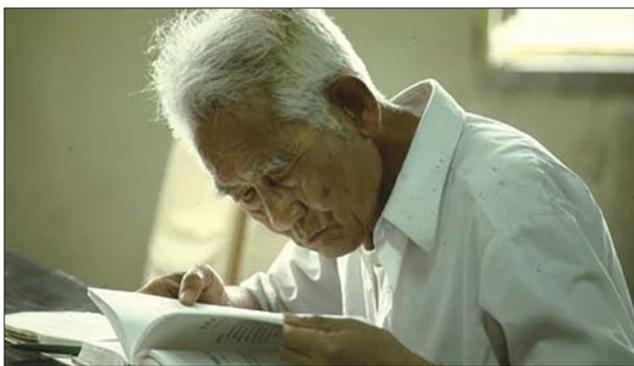
“咸菜疙瘩。”

为之。他任上海乐群中学校长时，亦是穿着破旧衣服，拿着一把破伞，天天步行来回奔波于住所和学校之间。

上大学时，他品学兼优，同学们都很佩服他，有一位女大学生，也是品学兼优，人长得很端庄貌美。对陶很欣赏崇拜，二人大概是惺惺相惜吧，便有了恋情，谈起了恋爱。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陶百川（陶的长兄），有一次去大夏大学发表演讲，就讲到他的弟弟陶愚川恋爱的事。这样一来，全校师生都知道陶愚川在谈恋爱。但事后的发展，出乎人们的预料，由于女方虽然很欣赏、崇拜愚川的才学，但对他的不拘小节、生活埋汰感到很中意，因而女方心里矛盾了，犹豫了，想分手又没看到其他出路，苦闷至极又得不到解脱，就跳井自杀了。噩耗传来，无疑对愚川如五雷轰顶，打击极深。为了纪念自己心仪的女友，愚川便决心一生不娶，走上了独身主义。“陶愚川从不过问政治，一心治学、读书、写作，是典型的书呆子。他哥哥做高官时，他也从不染指政治，更没有当官的想法和欲望。他不可能接受国民党交给的任务，更不会去做特务。”老先生肯定地告诉我们。

我们这次外调得来的材料，对于落实陶愚川的问题十分必要，也十分有益。之后，有关部门经过全面审查、核实，排除了陶的“特嫌”问题，并落实了相关政策，陶先生得到了解放，安排了工作。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知识分子政策逐渐得到落实，陶的问题也得到进一步的全面落实，并受到了党组织的关心、照顾。陶先生从此也有了愉快的心情，于是他一心一意地埋头于党的教育事业，决心为党和国家献出毕生的精力，他除做好教学工作外，便一心扑到他热爱的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的教育史，并用比较的方法撰写出《比较教育学》。

陶愚川先生几十年如一日在教育这块园地里，孜孜不倦地辛勤耕耘，终于积劳成疾，开始患胃病，后又患了脉管炎，截了肢，住进了泰安疗养院。那时，他是教育系的教授，我是学校系书记，我经常去看望他，学校党委也十分关心他，常派人去看望，并给他请了护理人员。我们每每去看望他，他都显得特别激动和高兴，1998年，最终陶先生病逝于泰安疗养院。



【曲师记忆】

## 特立独行的陶愚川先生

□郭廷良

资只有45元，两个儿子，爱人没工作，孩子和爱人没供应户口，全靠买高价的粮、油、煤等。每到月底，往往借债和吃救济金。第一次想去借钱时，我考虑很多，怕他不借，被他撵出来，因没有人敢向他借钱。在生活所迫，无可奈何的窘况下，我硬着头皮向他开了口。他听我说完借钱的事后，态度很冷静，不急不躁地说：“你借多少？什么时候还？”我答道：“借二十元，发工资后马上还。”他说：“那好，明天下午四点钟你来拿。”第二天下午我如约而至，二十元钱已放在了他的桌子上。等我发了工资，便马上先还陶先生的钱。后来，又曾借过两次，都是如同第一次一样，按时借按时还，一天都不能差。

大约是1970年夏，受系领导的派遣，我与李天辰去上海调查陶先生的所谓问题。因那时正在搞什么清理阶级队伍运动，想落实一下陶先生的几个问题，其中，包括所谓的“特嫌”问题。我们到上海之后，通过当地组织和有关人士找到了一位陶先生在上海工作、生活时的友好、同事。这位先生与陶是同乡人，与陶共事多年，对陶在上海的情况，包括陶在读书期间和后来在上海乐群中学工作期间的情况都很熟悉。当老先生得知我俩是来了解陶愚川的情况后，非常热情，他首先向我们询问了陶的一些情况，表示很想念他。之后，便毫无保留地给我们介绍他所了解的陶先生的情况：陶先生兄弟三人，其大哥陶百川，是国民党高官，曾任上海市市长；二哥陶广川，为一般知识分子。陶愚川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，曾去美国和日本留过学。陶家虽有钱有势，但愚川做人却很低调，从不恃才放旷，年轻时就不拘小节，穿破旧衣服，甚至穿补丁衣服，他一向是如此，恐怕是他的一贯作风，决不是有意装的，为丑化什么而

话，慢慢地他就不拒绝了，而是对我敞开了他的门，后来我便可以随时去他那儿。当我看到他床上的被子很旧很破，蚊帐很黑时，我对他说：“陶老师，我让我爱人给你换洗一下被子吧，蚊帐也给你拆下来洗洗。”他听后坚决地说：“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！”连续说了三个“不用”，我还想再劝说劝说，但他已把门打开，用手势下了逐客令。

说起当年自己经常借钱，“拆了东墙补西墙”的艰难岁月，我也很感激陶先生，我曾三次借过陶先生的钱。那时，我工

不久前，我从校报看到张顺清同志的一篇短文：《因陶愚川面世的〈学习材料〉》。由此，令我又想起了陶愚川先生。

“文革”前，陶先生在外语系教英语语法课，那时我是一名俄语班的学生，虽无缘聆听陶老师的课，但也时常见到他，而且，我们的班与英语班只一墙之隔，下课后或饭后我常常听到英语班同学谈论起陶先生。对他的学识、授课的方式，当时英语班同学崇拜得五体投地。说他讲课从不拿讲稿和课本，只在上衣口袋里装上几支粉笔，只要上课铃一响，陶老师便分秒不差地疾步走上讲台，用他那洪亮的声音滔滔不绝地讲起来，而且是边用英语讲课边把右手背过去，不用看黑板，快速、干净利落地写出他讲的英文来，一会儿就写满一大黑板。写满后擦掉，再如法写下去。如把他讲的，写在黑板上的全部记录下来，就是很好的讲义教材，不仅没有错误而且没有废话。当时，同学们还谈论陶先生个人生活方面的事情，一是他的独身主义，他自大学毕业从不谈恋爱，从不接触女性；二是他不拘小节，整天穿着一件衣服，又脏又破。因之，在那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，陶先生的上述行为被时代和世人所怀疑、误解。有的就认为他有意丑化社会主义，他不与人接触，不让别人进入他的房间，又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，室内有电台等。

“文革”开始后，陶先生便作为“牛鬼蛇神”和有“特嫌”问题被抛了出来，多次受到批斗，并被惩罚到学校大粪场，进行“劳动改造”。在“劳改”期间，陶先生如同他教学一样认真，按时按点到达指定的地点，认真地埋着头干活。夏天，烈日当空，汗流满面，在那又臭又脏的大粪场收拾、翻晒大粪，一干就是一整天。对此，陶先生总是默默地承受，从未发过牢骚。

“文革”中后期，我在外语系办公室工作，1969年至1974年间，我与陶先生同住原老附中家属院。每次见面，我都早早地地问一声陶老师好，他有时点一下头，有时哼一下。但从不主动地给任何人打招呼，对于这一点大家都见怪不怪。由于是邻居，又是一个系的，无论从私从公我都有义务常去看看陶老师，了解一下他有什么困难，有什么要求。开始他有点拒绝我去他的房间，只开着一扇门缝与我说

【老照片】

## 活在针灸世界里的外公

□张平

外公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。小时候，由于母亲得挣工分养家，我便成了外公家的常客，外公疼我胜过他孙子，让我这只“小狗”吃饱了都不想走。在流年的时光里，外公就是一座远方的灯塔。

外公每天都和针灸打交道，一个小小的方盒内，大大小小长短不一亮闪闪的针，就是外公的宝贝。都说外公扎针不疼，阵阵麻感，浑身舒坦。他常说，下针不能很猛，而要轻进慢弹。外公年轻时打过日本鬼子干过运河支队，因为外婆得了胃病，抓不起药，外公就在部队拜师学了针灸。我问外公，为什么都找你扎针，针灸很深奥吗？外公说：“大家针灸都一样，选穴与配穴也相差无几，针灸主要是针对慢性病的，想一把抓，不可能。”外公说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。

一次，洞头集的一位针灸师，一针下在病人胸部的一个穴位，由于运针时疏忽，起针的时候，怎么也取不下来，病人只好躺在那里，那根针像旗杆一样站着，请四邻的针灸同行来取，去了不少都没有取出，扎了根吗？这时，病人扎针的四周肌肉都有些发紫变黑，看来针是插在骨缝里了，做手术也不具备条件。直到下午不知是谁提到了外公，说：“三义庄有个高师傅，请他来试试吧。”

外公随人到了洞头集，见到病人，一看那针正好插在骨缝中，病人在痛苦呻吟着。外公让病人躺好，后背垫个枕头，让病人放松心情，闭上眼，吸气再吸气，呼气再呼气，反反复复，不知不觉外公轻轻地把那根银针取了出来。全场目瞪口呆，一片赞美之声。外公笑着说：“哪里，巧啦巧啦。”问原因，外公说：“你越是急着拔出来，针的吸力就越强。这就需要病人主动配合，让他呼吸放松，骨与骨之间产生张和舒的缓力，在他出气的时候，慢慢抽出，就是这样。”

针灸是外公的爱好，解除别人的痛苦就是他的快乐。对待针灸的病人外公从没有收过人家的一分钱，碰到路远的还要管上一顿饭。

